全球政治評論　*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

特集 006（2021） 頁 131-154

學術論文

「北方領土」與1970年代日中關係

Northern Territories Dispute in Japan-China Relations During the 1970s

木山元彰 *Kiyama Motoaki*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碩士
M.A.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摘要 / Abstract

東亞國際關係研究中，探討第三國如何評論其兩個鄰國之間的領土問題之研究仍不多見。日本與蘇聯不單是中共的鄰邦，同時各自也有深刻的歷史問題與領土問題待解決。冷戰期間中共如何看待日蘇之間的領土問題：「北方領土」，即成為一個值得探究的議題。《人民日報》是中共最重要的機關報，其報導將相當程度地反映當局的態度與政策。本文利用該報資料庫，以關鍵字搜尋相關新聞，試圖藉由《人民日報》對「北方領土」的報導，疏理並分析中共對日蘇領土問題的觀點變化。研究發現，《人民日報》依據當局不同時期的對外關係與外交理念，而對「北方領土」稱謂、歸屬立場、報導頻率、報導對象等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尤其 1970 年代日中建交以降，「北方領土」報導搭配「反對霸權」的主張，進行大量刊載，一時成為報上宣傳重點之一。日中建交以後，整個 1970 年代中共論述蘇聯

佔領下的「北方領土」，背後所代表的，除了敦促《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亦即「聯日制蘇」邏輯外，還有「三個世界理論」反霸鬥爭理念、以及宣洩中蘇領土糾紛之民族主義情感等，可謂三者思緒交織下進行對日宣傳的現象。

Japan and the Soviet Union have long-term territorial issue, so-called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dispute. China, as its neighbor, also has a complex history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with both Japan and the Soviet Union. Therefore, how China views and discusses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has become an interesting perspective to observe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in an alternative way. This research examines People's Daily, which is an official newspaper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 covering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in the 1970s. The study found that Chinese government's perception and position on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issue changed significantly after the Japan-China Joint Declaration in September 1972. Since then, its news is regularly accompanied by "anti-hegemony" slogan, and is consciously served as one of the propaganda tools in line with Chinese diplomatic ideology in the 1970s. By treating the Japan-Soviet territorial dispute, People's Daily announces the intention to unite with Japan in order to counter the Soviet Union, and also implies the ideological combat with the Soviet Union.

關鍵字：北方領土、《日中和平友好條約》、日中關係、中蘇關係、《人民日報》

Keywords：Northern Territories, Treaty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Sino-Japan relations, Sino-Soviet relations, People's Daily

壹、前言

日本與蘇聯／俄羅斯之間的領土問題，是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並且在冷戰（cold war）時期持續延宕，至今未能解決的東亞國際爭端之一。設若兩個國家之間有領土爭議，從國家利益的角度出發，各自不外乎據理力爭來強調自國的立場。但是，如中共面對日蘇領土糾紛的情況，若領土爭議是鄰國之間的糾紛，並不與自身直接相關，而這兩個鄰國分別恰好同時與自己也有領土爭議，在這個情況下會如何表態，便成為一個頗值得探詢的問題。事實上，中共未必能以中立的第三國立場來論述日蘇之間的北方領土爭議。中共論述蘇聯佔領下的「北方領土」或「北方四島」（蘇聯稱：「南千島群島」，本文以下統稱：北方領土），背後所代表的可能是在對蘇、日、美關係上適時調整自國利益、宣示革命立場的一個重要論述工具，取決於當時的國際環境而採取不同應對。

有關中共對北方領土的認知或態度，由於社會主義體制內部資料取得不易，加上該議題對大陸而言係屬旁枝，討論亦不常見，故本文以定期、長期、公開發行的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文本作為分析資料。[1] 利用「《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進行關鍵字搜尋，初步發現中共官方媒體 1970 年代對「北方領土」爭議的報導，以 1972 進行為界，其稱謂、歸屬立場、報導頻率、報導對象等皆呈現大幅度的變化。尤其純以報導數量觀察，1950、1960 年代幾乎沒有太多著墨的領土新聞，在日中建交至和平條約簽署的六年間呈現翻倍又翻倍、大量刊載的現象。本文從量的特殊現象

[1] 人民日報社是中共中央直屬事業單位和中共中央的新聞機構，也是中國大陸第一大報。自 1946 年創刊以來，積極宣傳共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中央重大決策、國內外各領域消息。作為反映中共當局言論動向的轉變之文本，不論將其視為報導或是宣傳，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其次，《人民日報》發行狀況穩定，取得容易，而且其編輯必須經過中共宣傳部門層層把關，就理解中共當局決策的認知與態度，以及思考過程而言，相對其它中共官方媒體是較為合適的資料。參照〈報社簡介〉，《人民日報社》，*http://www.people.com.cn/BIG5/50142/104580/index.html*，瀏覽日期：2021 年 7 月 16；岡部達味，《中共の対日政策》（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6），頁 61-62。

為出發點，以下將進一步分析該報報導日蘇領土爭議的質與當時中共對日、蘇外交的意圖與動機。

貳、「北方領土」與東北亞國際關係

一、日蘇領土問題簡介

北方領土是日方稱呼，係指北海道東北方延伸至千島群島間的四大島嶼，個別稱呼為：擇捉島、國後島、色丹島、齒舞群島。四島面積合計約為 5036km²，大約等同於千葉縣之面積，可謂廣袤遼闊。[2] 蘇聯則稱該地域為南千島群島或南千島地區（Южно-Курильский район），概念上是千島群島之南部地區。1875 年全千島群島歸屬日本逾 70 年後，蘇聯於 1945 年 8 月 9 日表明參與《波茨坦宣言》（Potsdam Declaration）並撕毀《日蘇中立條約》（Soviet–Japanese Neutrality Pact）對日宣戰，開始進攻涵蓋今日北方領土之南樺太（庫頁島）、千島群島等地，並佔領該域至今。[3]

有關日蘇領土問題的研究與討論，不外乎集中在歷史資料的探勘、條約簽署過程的檢討、乃至整理對方國主張變遷等，其中往往含有立基於民族國家（Nation-state）聲張自身立場的色彩。例如日本的先行研究大部分以整理明治時期前後的日俄關係、以及爬梳兩國領土條約等研究方式為主，進而強化日本固有領土主張的正當性。少部分的研究則與日本政府的官方立場不同，對四島歸還論進行質疑，指出北方領土是一種為了符合美國要求，從原本主張的二島歸還轉為四島歸還時將之合理化的官方製造之論述。[4] 而蘇聯方面的論述，則是主張應尊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果（戰後

---

[2] 〈北方領土の大きさ〉，《北海道標津町》，*https://www.shibetsutown.jp/shokai/hoppouryodo/size/*。瀏覽日期：2021 年 7 月 16 日。

[3] 〈クリミア（ヤルタ）会談文書：ソ連の対日参戦に関する協定〉，《データベース「世界と日本」》，*http://worldjpn.grips.ac.jp/documents/texts/docs/19450211.T1J.html*。瀏覽日期：2021 年 7 月 16 日。

[4] 大崎巌，〈「『北方領土』問題」に関する先行研究の到達点とその限界〉，《立命館国際関

秩序論），強調領土問題是美蘇意識形態對立下，日本受到美國操縱的產物。蘇聯從雅爾達會議（Yalta Conference）、《波茲坦宣言》、《舊金山和約》（Treaty of San Francisco）等條約，論證戰爭結果下蘇聯領有四島的立場，在方法上面亦是偏重於法律與國際關係史的探討，與日本可以說是殊途同歸。[5]

二、1970 年代美中蘇三角關係的形成

戰後，中蘇兩國於 1950 年 2 月 14 日簽訂《中蘇友好同盟相互援助條約》，將美國與日本視為假想敵以來，到 1960 年代中期皆維持著一定程度的友好關係。然而到了 1956 年 2 月，繼任的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批判前任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個人崇拜，並且稱呼史達林是濫用權力、整肅異己的人民公敵。這番發言使得奉史達林主義為圭臬，且同樣有偶像崇拜色彩的毛澤東感到不滿，導致了中共對蘇聯的反感。在此階段，中蘇關係表面下已經開始出現分裂的跡象。中共於 1958 年正式發動標榜「超英趕美」的社會生產運動：大躍進與人民公社，想要藉由大躍進樹立社會主義國家超越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榜樣，然而此舉讓蘇聯認為中共發動的理論攻勢是對蘇聯地位的挑戰。[6] 當蘇聯領導人開始批評大躍進運動的缺點時，毛澤東決心向蘇聯公開論戰，甚至批評赫魯雪夫「不懂馬列主義」，中蘇論戰逐漸浮上檯面。[7]

另一方面，毛澤東從 1949 年到 1976 年逝世為止，對美國的定位一直

係論集》，第 7 号（2007），頁 35-37。

[5] 大崎巌，〈ソ連から見た「北方領土問題」 ― 『日本年鑑（ЯПОНИЯ ежегодник）』資料分析を通して〉，《立命館国際研究》，27 巻 3 号（2015），頁 164-168；Keith A. Call, “Southern Kurils or Northern Territories? Resolving the Russo-Japanese Border Dispute,”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1992, Issue3.

[6] 沈志華，〈蘇聯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反應及其結果——關於中蘇分裂的緣起的進一步思考〉，《二十一世紀》，網路版 2003 年 3 月號，2003 年 3 月 31 日，*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online/0303090.pdf*。瀏覽日期：2021 年 7 月 16 日。

[7] 沈志華，同前註。

是帝國主義。尤其建政初期，毛將美國的對華政策定位為「美國帝國主義的反動對華政策」，歷經朝鮮戰爭與圍堵政策後更激發中共的反美情緒，為了輸出社會主義革命，中共試圖聯合社會主義各國打造統一戰線來對抗美帝。然而，由於中蘇交惡浮上檯面，加上文化大革命等高舉社會主義革命大旗的外交活動惡化對外關係，中共開始改變策略，試圖與美國改善關係以牽制鄰國蘇聯。[8] 1968 年蘇聯以有限主權論（Limited Sovereignty Theory）壓制捷克的布拉格之春，1969 年在中蘇邊境發生名為珍寶島事件的武力衝突以後，中共開始攻擊蘇聯為「社會帝國主義」，反而開始將蘇聯視為其主要敵人。[9] 另一方面，美國在越南戰爭（1965-1975）陷入泥淖，對中共圍堵政策的輿論也開始出現變化，例如 1970 年 1 月的大使級會談中，美國承諾將減少在臺軍事力量，以換取美中更高層級的會談。[10] 由此可見美國同樣開始調整中共政策，試圖在臺灣問題上讓步，以換得中共的協助，獲得越南戰爭的和平解決。[11]

1972 年 2 月，美中發表《上海公報》，公報中加入了所謂反霸條款，[12] 美中儼然成為「心照不宣的盟國」（tacit alliance），中共在 1970 年代的國際鬥爭主要目標成為反（蘇）霸，而不是階級鬥爭與世界革命，所以要聯合美國制衡蘇聯霸權。[13] 而美國則是利用中蘇分裂，拉攏中共，獲得了對

---

[8] 李振，〈建國後毛澤東對美國帝國主義的認知和應對〉，《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http://www.dswxyjy.org.cn/BIG5/n1/2019/1205/c423725-31492201.html*。瀏覽日期：2021 年 7 月 16 日。

[9] 毛里和子、毛里興三郎訳，《ニクソン訪中機密会談録》（愛知：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1），頁 259。

[10] 緒方貞子、添谷芳秀訳，《戦後日中・米中関係》（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2），頁 41。

[11] リチャード・L・アーミテージ，ジョセフ・S・ナイ Jr、春原剛，《日米同盟 vs. 中国・北朝鮮》（東京：文藝春秋，2010），頁 70。越南戰爭中，北越背後有中共的支持，美國要結束戰爭需要中共的讓步。

[12]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聯合公報–1972〉，《美國在台協會》，*https://web-archive-2017.ait.org.tw/zh/us-joint-communique-1972.html*。瀏覽日期：2021 年 7 月 16 日。

[13] 佐橋亮，〈米中和解プロセスの開始と台湾問題〉，《日本台湾学会報》，第 12 号（2010

蘇聯的中共牌。1970 年代的美中關係改善，可以說是雙方制蘇利益一致造成的結果。

三、日中建交、兩國對「反霸」認知差距

戰後日本與臺北建交的情況下，北京的對日政策是以送還日本戰俘作為親中團體的窗口，對準日本左翼人士與經濟界，進行「人民外交」，企圖從貿易鬆綁為起點，逐步促進政治關係正常化。[14] 周恩來又提出「對日二分論」，亦即日本軍國主義者與日本人民應區分的方針，對日本一般人民採取與中共人民同是受害者，不追究責任的論述。[15] 其目的在於希望拉攏多數日本人民反美鬥爭的聲勢，促使日本政府能改變對北京不友善的政策，進一步達到建交目標，亦即「以民促官」。[16] 所以，例如中共斥責親臺北的岸信介內閣（1957-1960）以及佐藤榮作內閣（1964-1972）為反華勢力，[17] 並且激勵日本左翼勢力支援安保鬥爭等反體制運動，蘊含了官民分離，以日本民眾的力量促使日本政府改變親美、臺政策的邏輯。

隨著美中和解，加上政見標榜改善日中關係的新任首相田中角榮於 1972 年 7 月 7 日上台，日中建交的進程一時之間飛快加速。田中在選前曾

），頁 178；James H. Mann 著，林添貴譯，《轉向 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秘》（臺北：先覺，1999），頁 57；張登及，〈中美建交三十年：北京對美政策與雙邊關係回顧〉，《全球政治評論》，第 32 期（2010），頁 58。

14 緒方貞子、添谷芳秀訳，《戦後日中・米中関係》，頁 17。

15 毛里和子，《日中関係 戦後から新時代へ》（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 25-26。此外，從國民黨的脈絡而言，此「二分論」之源頭，尚可以追尋到中華民國的蔣介石對日之「以德報怨」政策。參照川島真，〈戦後日中「和解」への道程とその課題──安倍談話の観点をふまえて〉，《問題と研究》，第 44 巻 4 号（2015），頁 10-11。

16 毛里和子，同前註，頁 26；中嶋嶺雄，《中共　歴史・社会・国際関係》（東京：中央公論新社，1982），頁 205。

17 例如岸信介與蔣介石之間的關係，參照丹羽文生，〈安倍外交と台湾—その政治的系譜—〉，《問題と研究》，47 巻 2 号（2018），頁 148-150。對於岸內閣的嚴厲批判參照田中明彦，《日中関係 1945-1990》（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頁 53；佐藤榮作內閣（1964-72）長期執政期間配合美國政策下的對華外交決策參照翟新，〈日本佐藤榮作內閣對華政策再評價〉，《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年，頁 85-87。

積極表達日中建交的意願，認為建立美日中等邊三角形的友好關係，方能帶來遠東地區的和平。[18] 9 月 25 日，田中訪問北京，經過四日談判，並於 9 月 29 日與周恩來發表《日中共同聲明》，日本正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聲明第八點指出，「為了鞏固和發展兩國間的和平友好關係，同意進行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為目的的談判」，[19] 是故，接下來的日中關係發展便可以說是以簽訂和平條約為主要目標。

但是，兩國對於和約內容的預期不盡相同。對中共而言，日中簽訂和平友好條約毋寧說是日中反霸權條約，在和約中加入所謂反霸條款，拉攏日本對抗蘇聯的反霸佈局，才是中方的首要目的。[20] 然而，對戰後日本而言，由於其缺乏權力政治的當事者意識，自然也沒有美中蘇戰略三角結構下促成日中接近的認知。日本的思惟接近於，在日美安保體制下，新的日中關係軸、日蘇關係軸之所謂等距外交成立，方能名副其實地對應到和平國家理念與穩固安全保障上的現實面，所以不願過於針對蘇聯。兩者對反霸的認知差距，導致 1970 年代中期和約談判陷入僵局。[21] 於是，在此期間《人民日報》對日蘇領土問題的大量報導，自然可以理解為是中國意圖分化日蘇關係、拉攏中日關係的文本，亦即經過安排的宣傳策略。

參、1950-1960 年代的「北方領土」報導

進入 1970 年代的《人民日報》對北方領土報導之前，先就 1955 年至 1969 年的報導進行探究，以便比較、理解 1970 年代的報導之異質性。在

---

18 田中明彦，同前註，頁 76。

19 〈日本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聯合聲明〉，《日本國駐華大使館》，*https://www.cn.emb-japan.go.jp/itpr_zh/bunken_1972seimei.html*。瀏覽日期：2021 年 7 月 16 日。

20 中嶋嶺雄，〈日中平和友好条約を見詰める〉，《正論》9 月号（東京：産業経済新聞社，1978），頁 59。

21 添谷芳秀，〈一九七〇年代の米中関係と日本外交〉，《年報政治学》，48 巻（1997），頁 7-14。

此期間，《人民日報》對日蘇間領土爭議幾乎不曾進行直接相關的新聞報導，皆是在反對日美同盟、抨擊日本當局對建交無作為等主題之下順道提及領土問題。亦即，對領土問題本身的始末沒有太多著墨，作為陪襯性質居多。即便如此，還是可以在極少數的報導篇章中，找到中共對日蘇領土爭議的態度變化。

1955 年 6 月，日本與蘇聯開始進行建交談判，在這個階段的領土主張上，日本政府採取「國後、擇捉兩島為南千島，包含在《舊金山和約》中日本所放棄的千島群島」，亦即僅要求歸還色丹、齒舞二島的立場。在日蘇交涉期間，曾經擔任蘇聯駐日大使，時任駐英國大使的馬利克（Yakov Malik）也曾一度表示蘇聯可以讓渡二島給日本。[22] 但是，由於美蘇冷戰，美國不希望日本過度親近蘇聯，美國便向日本政府施加壓力，不允許二島歸還簽訂和平條約。同年 10 月，受到美方壓力的日本政府突然改變政策，開始提出南千島不屬於千島群島的邏輯，並且強調擇捉、國後、色丹、齒舞四島一併歸還的北方領土論述，[23] 此乃是受美蘇對峙影響日本單方面創造出來的概念。[24]《人民日報》在《日蘇共同宣言》簽署前一週的報導，犀利地指出日本沒有爭取美國佔領的土地，反而只聲索蘇聯佔領的四個島嶼。亦即日本對待沖繩與南千島的雙重標準，暗示美國才是背後的操控者，美帝霸權與日本親美派勾結，讓領土問題擋住日蘇復交的去路：

> 在法律上，日本已經放棄了千島群島。千島群島當然包括千島群島的南部在內。但是，現在日本要求蘇聯放棄色丹和齒舞兩島的主權，還要求蘇聯放棄千島群島南部的國後島和擇捉島。日本政府不向美國要求領土，單單向蘇聯要求南千島群島；在對比之下可以了解，領土問

---

[22] 石郷岡建、黒岩幸子，《北方領土の基礎知識》（東京：東洋書店新社，2016），頁 39。
[23] 大崎巌，〈「『北方領土』問題」に関する先行研究の到達点とその限界〉，頁 29。
[24] 藤生将治，〈北方領土問題をめぐる「固有の領土」論（上）—国会論議・政府資料及び国際法の観点からの整理 —〉，《立法と調査》，428 号（2020），頁 158-171。

題不僅是領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25]

《人民日報》將日本刻畫為一個無理要求自己放棄的領土之主體，同時不難看出帶有對軍國主義復辟的警惕意涵。在此邏輯上，《人民日報》的報導中，領土問題本身並非首要問題，而是美國與其「追隨者」阻礙日本人民與社會主義國家建立關係的一種伎倆，且要「富有民族自尊心和熱愛祖國的」日本人民反對美國與反動政府。到了 1960 年代中期，伴隨中蘇意識形態之爭激起的領土糾紛，中蘇雙方開始就邊界問題召開外交次長層級的談判。經過雙方一定程度的讓步，正當初步合議的草案要送達雙方高層審閱期間，1964 年 7 月，日中友好協會副主席荒哲夫詢問毛澤東關於蘇聯佔領千島群島的看法時，毛澤東明言支持日本表示：

外蒙古的領土，比你們千島的面積要大得多。我們曾經提過把外蒙古歸還中國是不是可以，他們說不可以（...中略...）有人說，他們還要把中國的新疆、黑龍江劃過去。（...中略...）一百多年以前把貝加爾湖以東，包括伯力、海參崴、堪察加半島都劃過去了。那個帳是算不清的。我們還沒跟他們算這個。所以你們那個千島群島，對我們來說，是不成問題的，應當還給你們的。[26]

毛利用日蘇領土爭執，在接見日本社會黨議員團時順勢表明中共的立場，並且以「算帳」一詞表態，希望蘇聯在談判中讓步。但是此話一出，雙方態度轉趨強硬，導致中蘇邊界談判破局，無疾而終。[27] 同年 9 月，赫魯雪夫同樣在與日本議員代表團的會談中駁斥毛澤東，談到蘇聯的領土是

---

[25] 〈蘇日談判以來〉，《人民日報》，1956 年 10 月 10 日，第六版。

[26] 岡察洛夫（Sergey N. Goncharov）、李丹慧，〈俄中關係中的「領土要求」和「不平等條約」〉，頁 111。

[27] 沈志華，〈事與願違：冷戰時期中共處理邊界糾紛的結果〉，《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4 年 8 月號（2014），頁 56-57。

「在歷史上就形成了的」，而中共統治者才是「侵佔蒙古、西藏和新疆」；並揚言「如果誰把戰爭強加於我們，我們將會全力以赴地與其廝殺」。[28] 從上述兩國領導人的發言與發言對象可以見得，此時北方領土議題不僅成為中蘇之間角逐的舞台，日本議員還成為兩國在領土問題爭執上對罵的傳聲筒。儘管北方領土相關新聞一直到 1972 年日中建交前都不是《人民日報》的關心事項（每年零至三篇報導），仍然可以在微量的報導中觀察到，中共在日蘇糾紛上的立場於文化大革命前後，由蘇聯戰後秩序論逐漸轉向支持日本固有領土論的痕跡。

肆、「北方領土」與日中人民連帶

一、醞釀日中皆受害於蘇聯之情感

1972 年 9 月以降，北方領土相關新聞開始以極不自然的方式增加，至 1979 年底為止，累積將近有八百則相關新聞，可見其常規性地刊載於《人民日報》的情形。與 1950、60 年代相比，「北方領土」問題不再是批判日美合作或是評論亞洲局勢下襯托論點的配角，而是一舉躍升成為批判蘇聯的主角。接著，一律強烈支持其為日本領土，並多以日方說法稱蘇聯是非法佔領。是故，在島嶼總體稱呼上也皆以北方領土或北方四島稱呼。第三，大量引述來源日本政府及民眾說法，並仔細報導日本各地相關歸還請願活動。內容上，此時期的報導不脫反對蘇聯霸權的脈絡。惟有些新聞是在報導世界反霸戰線的脈絡下提到日本北方領土的例子；而另一類型則是探討日本國內北方領土歸還運動的情形、政府發言或是島民的陳情等，以此突顯蘇聯霸道之威脅，大意殊途同歸。

1972 年 9 月 4 日刊載的〈日本北海道各界一千五百人舉行集會強烈要求蘇聯政府歸還日本北方四島〉可說是此類報導的分水嶺。在此報導

[28] 岡察洛夫（Sergey N. Goncharov）、李丹慧，同前註，頁 113。

中，《人民日報》首度以整個篇幅介紹日本國內民眾參與的的領土歸還活動。其中引述日本人發言指出：

> 集會還通過一項宣言，宣言說：「我們感到極為遺憾的是，齒舞、色丹、國後、擇捉這些我國的領土，戰後二十七年來一直處於蘇聯的非法占領下」。[29]

儘管是從引述對象（日本人）的口中說出，標題已經明示「北方領土」以及四島名稱，並且認定蘇聯是非法佔領，近乎已經轉向日本「固有領土論」的立場。9 月 4 日距離《日中共同宣言》的簽訂尚有一個月的時間，《人民日報》已經開始超前部署，報導日本人民受到蘇聯霸權壓迫並挺身反對的狀況，自此開展近十年以上，利用北方領土議題作為反對蘇聯霸權的宣傳運動。

蘇聯佔領北方領土的事實，在美中接近、日中建交後的整個 1970 年代成為報導中佐證蘇聯「修正社會帝國主義」之惡，乃至反蘇的論據之一。例如 1976 年 7 月 19 日的報導中提到：

> 蘇聯社會帝國主義霸占著日本的北方領土，不僅不歸還給日本，而且不准日本提出歸還的要求（...中略...）中國人民將一如既往，同全世界各國人民一道堅決支持日本人民收復北方領土的正義鬥爭，並且相信日本人民的這一鬥爭必將最終獲得勝利。[30]

即便「反霸權」本應是中共對美、蘇兩大帝國主義進行批判與抵抗的詞彙，由於 1970 年代中共對美策略進入密切接觸、尚未建交的「既聯合

---

[29] 〈日本北海道各界一千五百人舉行集會強烈要求蘇聯政府歸還日本北方四島〉，《人民日報》，1972 年 9 月 4 日，第六版。

[30] 〈強盜的心理〉，《人民日報》，1976 年 7 月 19 日，第六版。

又鬥爭」階段，[31]《人民日報》在此時期的反霸權一詞就事實上等於是單獨反蘇。所以在相關新聞上連帶造成「北方領土」問題的始作俑者從過去「日美反動派勾結」轉向「蘇聯修正帝國主義」，對美國的著墨始終不深。內文表示中共「一如既往」支持日本人民鬥爭的立場或許為真，然而其鬥爭對象從美國轉為蘇聯，且熱烈支持日本領有不過是近五、六年來的變化。為了彌補此般歷史的短淺，《人民日報》藉由較長的日中人民鬥爭史，來彰顯事實上歷史較短、未來也不明朗的兩國反蘇「傳統」悠久，試圖鞏固某種道德的制高點。但是，從事後的角度來看，在論述中呈現的反而是傳統在短時間內被「發明」的痕跡。

相對於「心照不宣的同盟」，「亞洲集體安全體系」（The Soviet Union's Asian Collective Security Proposal，下稱：亞安體系）的推行可以說是蘇聯方試圖包圍中共的措施。亞安體系源自周恩來於 1954 年提出以亞太地區和平條約為目標的構想，蘇聯在 1969 年開始發表對亞洲安全體系的獨自見解，並於 1973 年 8 月大致底定其構想。木村汎從日蘇關係的角度指出，蘇聯在亞安體系的推行上，事實上最想拉攏的是日本，除了包圍中共，也同時有離間日美同盟的戰略意圖。若日本呼應或加入構想，等於是贊同蘇聯所主張的：維持戰後國境現狀，亦即變相承認蘇聯佔領北方領土的正當性。亞安體系可以說是蘇聯藉由確立在亞洲的優勢地位，而挽回在歐洲的劣勢、疏遠中共、並且拉攏日本之一石三鳥策略。[32] 在蘇聯的和平攻勢下，《人民日報》遂引述日本主流說法指出：

> 只要（蘇聯）不把這四個島嶼歸還日本，無論《真理報》怎樣反覆強調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及作為其基礎的原則，對日本國民來說，都是沒

---

[31] 朱新民，〈中共對外政策的轉變與持續──一九七八至一九八四中共對外政策的剖析〉，《東亞季刊》，第 16 卷第 3 期（1985），頁 26。

[32] 瀬川高央，〈ソ連の平和攻勢に対する日本外務省の情報分析と対応：1970 年代の「アジア集団安全保障構想」を事例に〉，《年報公共政策学》，第 10 号（2016），頁 168-169。

有說服力的。[33]

《人民日報》開始出現引述日本政府發言、媒體社論等報導，向國內發送日本反蘇的現況，可以理解為宣示兩國人民同為蘇聯受害者的連帶關係。亦即蘇聯帝國主義在世界各地擴張，連這小島都不願歸還，證明亞安體系強調的和平是一場謬論。同時也顯示，中共對蘇聯的反感不是一廂情願或空穴來風，國際上更不是孤立的，因為日本跟中國、還有其他各國一樣都是霸權的受害者，合作抵抗的動機便不證自明，無須贅言。

二、「對日二分法」的持續與「三個世界理論」的應用

1973 年 9 月 20 日，日本眾議院全會一致通過「四島必須歸還」的立場，日本左右兩派在面對與蘇聯的領土問題上達成了指標性的共識。[34] 日本國內政治的北方領土四島一併歸還主張愈趨穩固之際，《人民日報》同步開始刊載諸多日蘇外交動態，北方領土也隨之不斷出現在版面上。《人民日報》於 1970 年代確實是完全支持日本的立場。但是，儘管日中已然建交且中共又完全支持日本領有，從「北方領土」相關新聞來看，報導官方與人民（例如北海道漁民、各地民眾、親中政黨或組織等）之間文字的「溫度」，仍有差別。諸如報導日本官方談話與表態的則數較少、篇幅較短、引述和正文較為中規中矩。文中主要關心聚焦在日蘇關係，以及日蘇和平條約的簽訂進程的失敗。每一次日蘇談判因為領土問題不歡而散，《人民日報》便可以間接得證是蘇聯「修正主義」或「社會帝國主義」所以不得人心，獲得羞辱蘇聯的材料。[35]

---

[33] 〈日本報紙強調蘇聯必須歸還日本北方領土 揭露蘇聯兜售“亞安體系”進行擴張〉，《人民日報》，1973 年 9 月 1 日，第六版。

[34] William Nester, “Japan, Russia, and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continuities, changes, obstacles, opportunitie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4, Issue4, November 1993, p.720.

[35] 如石之瑜指出：「中共使用三個世界理論的目的，是為了想要羞辱蘇聯，而非是要和他作權力競爭（…中略…）這個理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蘇聯孤立出來，使其好像成為世

另一方面，例如 1975 年 5 月 11 日的《人民日報》第四版有關此次日本訪華團報告會的報導中所引述的談話，則是顯著地增加人民的色彩。訪華團團長坂本德松曾經創立亞非人民連帶日本委員會，[36]「亞非拉人民團結組織」正是與中共的自我定位以及團結第三世界反對帝國主義、反對霸權的統戰策略相輔相成的左翼國際組織。《人民日報》以具有第三世界色彩的日本「北方領土促進歸還訪華團」為槓桿，強化兩國人民都與蘇聯有領土問題=被蘇聯壓迫=一同反對社會帝國主義=一同反對亞洲安全體系等連帶合作關係的論述如：

> 日本人民反對蘇聯霸權主義、反對蘇聯一手策劃的「亞安體系」、要求收復北方領土的運動，必須同中國及第三世界各國加強團結，相互支援，開展鬥爭。[37]

即便日中兩國官方已經建交，在《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及其反霸條款遲遲不如中共的主意進行時，《人民日報》仍傾向從日本人民著手，在宣傳操作上隱然殘存以民促官邏輯作用的跡象。《人民日報》在 1975 年 12 月 28 日的〈亞洲人民在鬥爭中勝利前進〉報導中，從東南亞、南亞、中東各國的獨立自主運動一路介紹到東北亞的日本時，陳述了日本漁民受蘇聯威脅的情形，進一步提及：「日本屬於第二世界，日本民族也是超級大

界聯合陣線的主要目標（…中略…）中共只是希望能夠成為霸權的敵人，這樣才能證明它代表革命力量。」參照石之瑜，《中共外交理論與實踐》（臺北：三民，1994），頁 113。

[36] 坂本德松（1908-1988）是日本的評論家，前愛知大學教授。特別著重實踐第三世界的連帶，曾創立日越友好協會，歷任亞非人民連帶日本委員會、日東友好協會理事長等職。參照日外アソシエーツ編集，《20 世紀日本人名事典》(東京：日外アソシエーツ，2004)。

[37] 〈中日友協舉行報告會 歡迎日本促進歸還北方領土活動家訪華團〉，《人民日報》，1976 年 5 月 11 日，第四版。

國霸權主義的受害者，直接面臨著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威脅」。[38] 1974 年 2 月 22 日，毛澤東會見尚比亞總統卡翁達（Kenneth Kaunda）時提出了三個世界畫分理論，表明中共的國際戰略觀的轉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39] 同年 4 月，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鄧小平代表中共在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中，進一步地闡述理論，以包含中共在內的第三世界為反霸的主力，第二世界為反霸鬥爭中可以聯合的對象，第一世界為打倒的對象。[40] 至此，社會主義陣營宣告不復存在，中共國際戰略觀正式從兩大陣營變為三個世界。[41]

從中共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的外交戰略而言，日本屬於三個世界理論中的第二世界，日本儼然成為中共在亞洲地區聯合反對蘇聯下亟欲拉攏的對象。所以，《人民日報》往往將蘇聯霸權壓迫日本的代表性議題北方領土，與其他第二、第三世界國家的反霸言行一同刊載，加強其三個世界理論與「一大片」（團結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對抗蘇聯擴張）的論述原則，加以宣傳。[42] 例如報導斯里蘭卡左翼組織「支持毛主席提出的關於三個世界的理論」且又「支持日本人民收復北方領土的鬥爭。他們還歡迎最近簽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態度；[43] 乃至引述泰國媒體的評論指出「蘇聯侵佔日本的北方四島，拒絕歸還，力圖阻撓日中締結和平友好條約，這等於是干涉日本

---

[38] 〈亞洲人民在鬥爭中勝利前進〉，《人民日報》，1975 年 12 月 28 日，第六版。

[39] 姜安，〈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政治考量與時代價值〉，《中共社會科學》，2012 年第 1 期（2012），*http://www.hswh.org.cn/wzzx/llyd/zz/2014-10-13/28375.html*。瀏覽日期：2021 年 7 月 16 日。

[40] 尹慶耀，《中共對外關係史料（下）》（臺北：作者自行出版，2000），頁 62。

[41] 尹慶耀，〈蘇聯解體與第三世界〉，《問題與研究》，第 31 卷第 6 期（1992），頁 71。

[42] 毛里和子，《日中関係 戦後から新時代へ》，頁 87-88。

[43] 〈斯里蘭卡青年組織舉行討論會毛主席三個世界理論是世界人民的強大思想武器 斯中友好協會舉行紀念毛主席的講演會〉，《人民日報》，1978 年 9 月 23 日，第五版。

內政」等，[44] 便是將北方領土與《和約》相結合，再與第三世界反霸各國置於同一脈絡，打造世界同仇敵愾氛圍的例子。

至此可以觀察到，美中蘇三角形成後，北方領土在《人民日報》上的性格從日本「無理要求歸還」到「被蘇聯強佔、壓迫」的轉變。具體而言，在蘇聯展開亞安體系論述試圖包圍中共；而中共則以積極促成「反霸統一戰線」羞辱蘇聯時，[45]「北方領土」的報導便積極與「三個世界理論」、「一條線、一大片」思想結合起來，成為中共聯日制蘇時的重要宣傳著力點。

伍、「北方領土」與《日中和平友好條約》

一、爭奪日本：在反霸與睦鄰之間

1977 年至 1978 年期間，由於蘇聯將北方領土設定於自國專屬經濟區內，而引發日蘇兩國一連串糾紛。《人民日報》為持續凸顯蘇聯蠻橫的形象，往往使用更為口語、更帶有情緒性的修辭。例如以〈得寸進尺〉為標題，明示惡鄰的存在，牽制蘇聯單方面推出的日蘇睦鄰合作條約：

> 蘇聯硬把北方四島水域劃入它的二百海哩漁業專管水域，現在又踐踏協議，要永遠霸占北方四島，這本來就很不“睦鄰”，是欠了日本的債的。[46]

石之瑜指出，不論是社會帝國主義或是反霸權主義的辭令，皆是中共羞辱蘇聯的技巧，而非現實主義者（realists）權力鬥爭的工具。[47] 該文強

---

[44] 〈泰國報紙譴責蘇聯對日本搞霸權主義 三木首相重申蘇聯必須一攬子歸還北方四島〉，《人民日報》，1976 年 1 月 20 日，第六版。

[45] 宮力，〈“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對當代中共的深遠影響〉，《中共社會科學》，2012 年第 8 期（2012），頁 24-25。

[46] 〈得寸進尺〉，《人民日報》，1978 年 1 月 17 日，第六版。

[47] 石之瑜，《中共外交的理論與實踐》，頁 115。

調，反對蘇聯霸權的戲碼中，「中共可以創造出一種受威脅的感覺，以滿足認知上自詡為道德領袖的需求，使政治成為有意義的活動」。[48] 在這個背景下，《人民日報》針對北方領土明顯也是站在一種道德高度上穿插譴責的報導。這般脫離新聞客觀原則的措辭乃至幾近評論的報導中，越是揭露蘇聯的槍砲對日本一般人民的欺壓，日本絕對的正當性就相對浮現。中共除了試圖掌握道德高度之外，其中儼然包含蘇聯「霸權」沒有資格與日本簽署和平條約，亦即中共比蘇聯「還要和平」，「更適合簽訂和約」的實際用意存在。如「新沙皇在日本人民面前橫行霸道，只能促使日本人民更加看清它的社會帝國主義的本質，進一步激起日本人民反對蘇修霸權主義、要求歸還北方領土的鬥爭」的措辭，[49] 在《人民日報》的宣傳上，蘇聯動作越多，就越成為其展示蘇聯的「睦鄰」終究都是謊言的材料，而看似壯大日中關係升溫的聲勢。

在刻畫日本人民的情緒上，即便僅摘出其中一段，哀怨、憤怒、恐懼、無奈的情感交融而成，躍然紙上：「夕陽西下，島影幢幢。啊，那就是我們祖先開拓的地方！」，而漁民這片對海域的恐懼則是來自於「怕漁船被蘇聯抓去」。[50] 有研究指出，這種訴諸情感的語言，是戰後初期，以根室為首的當地居民為生存問題挺身爭奪漁權的運動帶來的。但是，爾後日本政府轉型挾帶民族主義敘事的四島歸還論述中，這種草根的聲音卻也一併收編網羅在北方領土語境裡面。[51] 在此期間，《人民日報》採訪當地漁民、島民、居民不同聲音不滿的紀實報導，一方面雖然是與日本主流論述同步，另一方面，溯其源頭，其本身帶有底層民眾抗爭（對日本中央政府、蘇聯皆

---

[48] 石之瑜，同前註，頁 120。

[49] 〈大棒嚇不倒日本人民〉，《人民日報》，1976 年 3 月 3 日，第五版。

[50] 〈“還我島嶼！”——記日本北海道“要求收復北方領土運動月”〉，《人民日報》，1973 年 9 月 2 日，第六版。

[51] Alexander Bukh, “Constructing Japan's 'Northern Territories': Domestic Actors, Interests, and the Symbolism of the Disputed Islan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12, Issue3, September 2012, pp.499-501.

不滿）的性質存在。下面這則報導更是強調千島一般民眾發聲的性質：

> 這部書本身就說明包括占守島在內，整個千島都是日本的固有領土…(中略)…總有一天，我們日本人民還會回到占守島，繼續當占守島的主人。[52]

占守島不含在日本官方所要求歸還的四個島嶼中，是千島群島位置最北的島嶼。[53]要求歸還全千島事實上是日本社會黨、日共一度用以對抗日本政府四島歸還論述的主張。由此可見《人民日報》整體雖然以日本政府立場為主軸，不時仍有選擇 1950 年代日本左翼政黨較為極端的主張加以宣傳的案例。[54]

言歸正傳，《人民日報》往往引述日本的說法：亦即沒有解決領土問題，就不該談日蘇和約（日蘇睦鄰合作條約）。從日本政府的角度而言，日中與日蘇的和約簽訂並不盡然是互斥的選項。[55] 然而，《人民日報》不斷在國際版上增強這種「日蘇和約無望」的言論，事實上反映了中共的思考。對中共當局而言，日中與日蘇的和約是某種零和遊戲（Zero-sum Game），中共極力拉攏日本以牽制蘇聯，而日本不得不在中共「反對霸權」與蘇聯「亞安體系」、「睦鄰合作」等兩種和平之間選邊站。[56] 於是，在報紙上，日中兩國人民共同支持北方領土彷彿就成為某種聯手追求和平（選我）、抵抗禍端（別選蘇聯）的保證。凸顯的是中共與日本人民站在一起

---

52 〈千島群島的主人〉，《人民日報》，1977 年 9 月 27 日，第六版。

53 日本政府雖然對四島以外的千島群島沒有領土主張，但是採取在日蘇（俄）和平條約締結以前，這些島嶼歸屬何國有待商榷的立場。參照：《2019 年版われらの北方領土資料編》（東京：外務省，2020），*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35454.pdf*，頁 10。瀏覽日期：2021 年 7 月 16 日。

54 Bukh, pp. 491-493.

55 田中明彦，《日中関係 1945-1990》，頁 92。

56 参照吉田実，〈日中平和友好条約交渉の全貌 崩壊した「社会主義的連帯」〉，《日中報道回想の三十五周年》，網路版頁 7-8。

憤怒、發難，堅持保護領土之受壓迫／維護正義形象，並且明示暗示反霸權條款的必要性。

二、日中人民攜手對抗霸權收復失土

接著要觀察的是中共將日蘇領土糾紛與中蘇領土糾紛的新仇舊恨交織其中的可能性。[57] 例如 1975 年 2 月 6 日的〈花招掩蓋不了擴張的本質〉中，首先以「蘇聯新沙皇為了使它的軍事力量通過日本海進入太平洋稱霸，多年來玩弄各種花招霸占日本北方領土」破題，詳述蘇聯在外交場合上如何「制壓」日本後，在文末指出：

> 這使人想起當年沙皇尼古拉一世指著被俄國侵占的中國黑龍江口廟街一帶的地圖說的一句話：“俄國國旗不論在哪里一升起來，就不應當再降下來」。[58]

廟街（Nikolayevsk）位於黑龍江口北岸，原隸屬清，1850 年沙俄侵略軍駐紮於此，並於 1858 年《璦琿條約》確定割占沙俄，是中共近代史上割予俄國的一塊「失地」。[59] 將日本失地與中共失地並置在同一個報導，除加強日中人民受害連帶感之外，恐怕也含有幾分藉此強調領土問題，順道指桑罵槐的意圖存在。同一時期，《人民日報》也提起另外一個失地：1900 年以降沙俄長期侵佔的江東六十四屯，[60]並同樣以當地居民的聲音抨擊沙皇的不道德：

---

[57] 施哲雄的先行研究中已經討論到中共將日蘇領土問題與中蘇領土問題結合的意圖。參照施哲雄，〈日蘇千島羣島之爭〉，《東亞季刊》，第 11 卷第 3 期（1980），頁 56-57。

[58] 〈花招掩蓋不了擴張的本質〉，《人民日報》，1975 年 2 月 6 日，第五版。

[59] 王輔羊，〈我們的失地——廟街、海參崴、伯力、江東六十四屯、庫頁島〉，《中共邊政》，192 期（2012），頁 125-130。

[60] 參照王輔羊，同前註，頁 125-130。

> 江東六十四屯被燒殺掠奪一空以後，沙皇侵略軍又把長十二里，足有幾千棟房子的古城愛輝燒成一片瓦礫。[61]

1973 年 3 月 7 日的〈望鄉閣下漁民怨〉，是關於失去北方領土的北海道根室民眾心聲的報導。與此同一版面的另一則新聞中，《人民日報》將蘇聯取自中國獲得的失地名稱予以羅列，並進一步批判其更名為俄語的動機：

> 多年來，蘇修不擇手段地篡改歷史，編造出黑龍江以北和烏蘇里江以東是沙俄首先開發的無主土地的大謊言」，並指出這是「暴露他們的侵略野心罷了。[62]

《人民日報》以日中兩國領土皆遭侵佔，強調蘇聯的霸權性質，且加強日本的受害者形象的同時，看似也隱含著中國受蘇聯壓迫的論述結構。政治體制不同的中共與日本在此站在「還我領土」同一陣線反抗霸權，與三個世界理論中拉攏第二世界國家日本為反蘇聯霸權力量的思路吻合。這樣的報導傾向，一直持續到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簽訂以後的 1980 年代中期，才因日中關係的蜜月期結束、中蘇關係開始融冰而有轉變的跡象。

陸、結語

本文探討了 1970 年代日中建交以降《人民日報》對日蘇「北方領土」的

---

61 〈愛輝縣軍民滿懷對老沙皇和新沙皇的無比仇恨 狠批林彪妄圖投靠蘇修的罪行〉，《人民日報》，1974 年 4 月 28 日，第一版。

62 〈兩種手法一個目的——蘇修更改遠東地名的醜惡用心〉，《人民日報》，1973 年 3 月 7 日，第六版。

報導情形。研究發現，中共對於該議題的高度關心，反映中共的對日、蘇政策轉變及其心理變化。

1969 年以後，中共體認到蘇聯的軍事威脅，便著手調整一貫反美的對外政策，美中兩國在抗衡蘇聯、反對蘇聯霸權擴張主義上取得共識。[63] 1972 年 9 月簽訂《日中共同聲明》與日本改善關係以降，中共的對外政策論述從中間地帶理論轉變為三個世界理論，此舉乃是希望極力聯合世界多數國家反蘇的表現。日本是中共眼中亞洲唯一的第二世界，獲得日本對抗蘇聯的保證成為當務之急。但是，由於日本當時採取等距外交理念，造成雙方在《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的反霸權條款的採納上延宕多年，於是北方領土便成為離間日蘇關係唯一有效的論述、拉近日中關係的重要宣傳工具、在中蘇關係間強調己身道德高度的材料。

此時期的報導中，北方領土與反對霸權主義可以說是一體兩面，不論是從反霸的角度提及北方領土，還是從北方領土問題彰顯反霸的意義，指涉的皆是反對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沙皇侵略、修正主義等惡行。《人民日報》不僅聲援日本人民的鬥爭，支持日本領有四島，還將泰國、斯里蘭卡、尚比亞等第三世界國家支持日本的言論寫進報導裡，顯見三個世界理論的原理亦然作用其中。誠然，最重要的仍然是強調中共與日本人民共同受到蘇聯霸權壓迫，形成一種受害者的連帶合作關係，以期共同革命來反對霸權。

《人民日報》撰寫日本人民，尤其北海道漁民或是前島民時，往往使用近似天怒人怨、百般無奈的敘述，彰顯必須奪回島嶼的正義感以及蘇聯的邪惡性質。在強調蘇聯的邪惡性質時，同時形成一種日本終究不可能與蘇聯談論和平或睦鄰，以此凸顯《日中和平友好條約》才是「大勢所趨」之效果。製造日中人民攜手邁向和平未來的論述時，《人民日報》不忘將中蘇領土問題與日蘇領土問題並置，將近代史上中國割予沙俄的廣大失地與四島的新仇舊恨交織成篇，並含怨譴責。要言之，《日中共同聲明》以

[63] 代兵、張碧坤，〈1969 年：中美蘇戰略大三角形成的起點〉，《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8 年 2 月號，頁 82-85。

降，1970 年代《人民日報》對北方領土的報導中，有締結《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反霸條款」的目的、羞辱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需求、以及領土問題與民族主義激發的報復語言，以前者為首，三樣企圖與情感相互交錯，形成對日、對蘇宣傳文本。

責任編輯：梁庭瑋